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 民主及其批评者(上)

[美]罗伯特·A.达尔◆著

曹海军 佟德志◆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 民主及其批评者(上)

[美] 罗伯特·A.达尔 ◆ 著

曹海军 佟德志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及其批评者 / (美)达尔著;曹海军,佟德志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45-4

I. ①民…

II. ①达… ②曹… ③佟…

III. ①民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312 号

## 民主及其批评者(上、下)

著 者:(美)罗伯特·A.达尔

译 者:曹海军 佟德志

责任编辑:崔文辉 马忠平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2 字数:44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45-4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 60 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 60 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 30 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 20 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 80 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 80 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 80 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 年 9 月 28 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 中译本导言

## 民主理论的批判与重建

提起民主，在美国灿若星河的政治理论家中，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罗伯特·达尔（1915—）。在那些仍然健在的美国政治理论家中，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这位耶鲁大学政治学的杰出教授、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是国家科学院的成员、美国哲学协会的会员、不列颠研究院的通讯会员、塔尔科特·帕森斯奖的得主、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奖得主、美国政治学会詹姆斯·麦迪逊奖的得主。

达尔著有著作和教材二十几部，其中几部已经被公认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达尔几乎所有的著作均围绕着民主理论展开：不仅其《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民主理论的前言》成为多元民主理论的代表作，而且其《民主理论及其批评者》以及《论民主》等著作在美国民主理论界更是举足轻重。

在美国政治学界，达尔享有极高的声誉。执当代民主化研究牛耳的亨廷顿服膺达尔的民主理论。在其代表作《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以达尔的民主概念作为展开分析的基础，将民主政治的关键视为竞争和参与。<sup>[1]</sup>当代英国民主理论研究的专家赫尔德亦将达尔的多元民主模式视为当代民主理论的典型，<sup>[2]</sup>达尔更是被人誉为“我们时代最卓越的政治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格林斯坦称达尔为“我们时



代的首席民主理论家”。德克萨斯大学的费什金则称之为“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的首席分析家”。康耐尔大学的西奥多·洛威则称之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sup>[3]</sup>美国著名的政治科学家派伊极其推崇达尔在民主研究领域中的贡献。

中国学术界对达尔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从早年王沪宁等人翻译的《现代政治分析》开始到今天，达尔有六部著作被译为中文公开出版，计有《现代政治分析》<sup>[4]</sup>、《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sup>[5]</sup>、《民主理论的前言》<sup>[6]</sup>、《论民主》<sup>[7]</sup>、《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sup>[8]</sup>等书。其中，《论民主》一书几乎在英文版出版不久即有中译本，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较好的影响。除了这本《民主及其批评者》外，达尔的很多其他作品亦正在翻译过程中，如由本人翻译完成的《美国宪政的民主批判》一书已经翻译完成，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的版权已经解决，正在翻译过程中，准备加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理论译丛，达尔的《革命以后》一书的版权正在联系过程中。如果有机会，编译一本《达尔文集》，收录达尔的一些论文一定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而如果那样的话，写一本达尔民主理论的著作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些工作不但会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达尔民主理论的进一步了解，而且亦会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较好的影响。

达尔该书旨在着手解释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但从广阔的历史时段描述了民主发展的历史，而且从宏观的理论角度分析了民主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明确提出并阐释了程序民主、多头政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加之鞭辟入里的科学论证，条分缕析的框架构建，使作者该书如行云流水，清新可人。本书虽脱胎于耶鲁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上课用的教材，但一问世即得到学界的如潮好评，不但奠定了作者在民主理论研究方面的首席地位，同时也使这本书成为达尔民主理论的扛鼎之作。在为《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派伊这样写道：“当达尔谈起民主时，每一个人都应洗耳恭听。”<sup>[9]</sup>



## 一、守望民主：民主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无论是民主的制度，还是民主的观念，其缓慢而又坚强的发展都是在日积月累之后才显现出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时，我们常常会惊叹于在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形成的巨大差别。达尔指出：“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假想的雅典式公民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们中间，他必定会认为，现代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sup>[10]</sup>

那么，现代人是否认可古代人的民主呢？当代民主理论家萨托利曾做过这样一个假设：

假如我们某个早晨醒来时已置身古代雅典，我们很可能会发现那里的民主是侵略成性（要远甚于我们的竞争性市场社会）、令人窒息和不安全的（就我们早已习惯的个人权利而言）；此外，我们肯定不会免于政治恐惧。”<sup>[11]</sup>

民主的古今之争拉大了“此民主”与“彼民主”的距离。那么，差距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这并不是知识考古的问题，它实际上从时间的维度上昭示了民主的现代性，它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这样一系列问题：希腊人的民主是什么样的？现代人的民主是什么样的？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民主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做一个通盘的审视。

达尔归纳了希腊人的民主观。他认为，在古代希腊，一种民主的秩序至少要满足6项要求：

1. 公民利益之间必须足够和谐，以便他们能够分享并按照一种强烈的普遍善的感觉行事，这种普遍善不会与个人的目标或利益存在显著的矛盾。

2. 公民之间必须具备高度的同质性特征，否则就会产生政治冲突并在

公共善方面产生明显的分歧。

3. 公民团体必须相当小。

4. 公民们必须能够召开公民大会并直接决定法律以及政策的决策。

5. 公民参与并不仅限于公民大会，它也包括对城邦管理的积极参与。

6. 最后，至少从理想的意义来说，城市国家依然保持了充分的自主性。<sup>[12]</sup>

达尔的6项要求充分描述了雅典民主的图式，勾画了古代民主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即向城邦民主转型的过程，它成为第一次民主转型，在古代希腊实现了城邦民主的制度与观念。然而，这一转型却在另一次转型中成为历史。那就是达尔所谓的第二次民主转型。达尔主要从规模的角度阐释了民主的第二转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标新立异的。这一转型的标志是民主走出城市国家的历史角落，迈向民族国家的辽阔领域。这一过渡给民主观念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民主能不能超越城邦的规模限制走进大的共和国，这是决定民主生死存亡的重大挑战。达尔指出了这一规模变化带来的八个主要后果。

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代议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代民主的公民集会。如果说民主与共和已经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本框架的话，那么，代议制民主的形成并最终确立实际上将这一框架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造。这一改造是如此之大，不但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聚讼纷争的重大主题，而且使代议制民主作为从城市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解决方案消除了古代民主国家的规模限制，并将民主从仅仅适用于城邦的学说转化为一个适用于现代大型民族国家的学说。

当密尔最终宣称“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sup>[13]</sup>时，代议制政府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得到确立。对熟悉古代民主的人们来说，代表制和民主制的结合的确是一个神奇和划时代的发明。麦迪逊曾经认为共和就是代议制，而密尔则称代议制为“现代的伟大发现”。这一理论在解决了民主转型的同时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推动着民主观念的更新。例如，代议民主制度使政府远离了民众直接接触及的范围，它还存

在着民主的合法性吗？人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内部自治、党派之争、利益多元等一系列与古代民主完全南辕北辙的政治现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使得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之间的差距被越拉越大。

代议制方案的施行从根本上使民主适应了第二次转型的需要。直观看来，民主在更大规模的民族国家中实现了，然而，更深层的后果更值得关注。对参与民主的限制、差异、冲突、社会的和组织的多元主义等都与代议制方案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古代民主面临着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随着规模的增加，居民倾向于在与政治生活有关的方面展示更大的差异：这体现在地域忠诚、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职位、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这明显区别于古代民主的高度同质化；社会群体和组织享受着充分的自治，为民主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多元面向，这与古代民主的小型公民团体又有天壤之别。因此，现代民主更需要具有包容精神的选民、广泛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存在于大国中的那种惊人的多样性。尽管如此，现代民主造成的这种差异仍然会滋生政治分裂和冲突，这使得人们逐渐将政治冲突视为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方面，是政治的常态，而不是变态。这与古代民主的那种和谐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与规模因素联系不大，但个人权利的增加无疑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一个最为显著，甚至是令人吃惊的特征。这一特征成为民主古今之争的一个核心议题，对它的反思不但划清了两种权利，从而最终为“两种自由”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且厘定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关系，澄清了两种民主与两种权利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

事实上，雅典并不是没有自由；相反，由于民主制的实行，雅典的成年男子拥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从而使雅典存在着一种极其发达的自由，那就是政治上的自由。然而，希腊人通过民主实现的自由只是自由的一个方面，对于以个人权利为特征的个人自由，雅典是极端缺乏的。萨托利之所以将雅典这个“民主圣地”视为“恐惧之国”，认为，希腊“社会不允许给独立性留出余地，也不允许个人得到保护，它完全吞没了个人”。<sup>[14]</sup>只有现代民主才通过扩大权利，并进一步将基本的权利，如生命、自由、财

产等权利列入宪法，才在最终意义上实现了另一种权利或自由，即现代人的自由。在利益冲突经常化、决策结果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人权利的增加为某些自由提供了保障，从而使其不易受到一般的政治决策所侵犯。这种权利的变化界定了民主发展的古今界线，成为第二次民主转型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通过对比古今民主，达尔理清了民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通过考察民主发展的规律，达尔对民主化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估计。在他看来，无论是已经实现了多头政体的国家，还是没有实现多头政体的国家，都会在第三次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朝着更民主的方向迈进。这体现为三个变化：

“1. 多头政体的条件在不同国家的变化可能导致多头政体数量上的变化。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多头政体局限于条件特别适合的几个国家；另一个极端情况是，它可能扩大到涵盖了占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国家。

2. 政治生活规模的变化可能又一次根本改变了民主进程的界限和可能性。

3. 制度和意识的变化可能会促进有些现在实行多头政体的国家的政治生活更加民主一些。比如，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可能是公民政治资源和能力的进一步平等化造成的，或者是民主化进程扩大到先前由非民主进程统治的重要机构造成的。”<sup>[15]</sup>

达尔对民主化第三次转型的乐观估计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三波民主化理论相映成趣。据亨廷顿对民主化进程的审视，民主不断发展的脉络大致如下：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 年—1926 年

第一次回潮：1922 年—1942 年

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 年—1962 年

第二次回潮：1958 年—1975 年

第三波民主化：1974 年—<sup>[16]</sup>

我们看到，与亨廷顿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理论相比，达尔的三次



民主转型理论则是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揭示了民主古今之争的重大主题。两相比照，堪称民主化的“姊妹”理论。

达尔对民主化前景的乐观估计直接来自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政治实践。我们看到，民主的发展由涓涓细流汇为洪波巨浪，自 19 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三度掀起制度变迁的浪潮。方兴未艾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正在创造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迹”：民主化在波兰用了 10 年，在匈牙利利用了 10 个月，在东德用了 10 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 10 天，在罗马尼亚则只用了十小时，<sup>[17]</sup>对民主化的乐观估计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卫·波特（David Potter）认为，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冲击。<sup>[18]</sup>与这些乐观的估计相比，达尔还是对民主化的突飞猛进表示了谨慎的乐观。达尔指出：

世界上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国家实行的是多头政体，这并不奇怪。另一方面，如果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 20 年有一个大的改变那才是令人奇怪的。如果民主的观念有可能保持着对非民主国家公民的强烈的吸引力，而且，现代的、发展的而且更加多元的社会在某些国家发展起来，他们的独裁主义政府就会发现，抵御更进一步民主化的压力会越来越难。<sup>[19]</sup>

针对民主化，达尔提出了多头政体的理论，对如何建设一个多头政体，多头政体的有利条件等内容进行了分析。<sup>[20]</sup>事实上，达尔不仅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发展进行了勾画，在这里，达尔更多关注了政治平等、经济民主等论题，体现了达尔一贯的理论兴趣。

达尔将平等权视为政治参与必须拥有的政治资源，他认为，为了实现政治平等，一个发达民主国家可以有意识地制定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即使是做得最好的发达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在政治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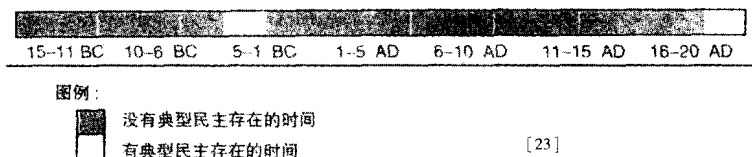
源、参政能力和参政机会方面也仍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因此，发达民主国家民主化的目标应该是“致力于减少那些会引起严重政治不平等的可以补救的原因”。因此，达尔得出结论认为：

一个发达民主国家可以积极地寻求减少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的严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资源、地位和机会以及知识、信息和认知能力的分配造成的。<sup>[21]</sup>

此外，达尔还重点考察了经济民主的问题。他批评了“股东民主”的说法。他认为，“股东民主”在语义上是矛盾的，因为根据股票选举破坏了民主程序的基本标准：公民的平等选举；而且，即使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不可靠的前提，即企业（内部）统治的权利全部赋予所有者，也不会推导出“股东民主”是合适的解决方式的判断。达尔深受林德布罗姆等新多元主义的影响，试图提出一套将民主原则应用于经济秩序的理论。与股东民主相对，达尔在其后出版的《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明确提出一种“车间民主”（workplacedemocracy）的概念，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政治平等，同时又不损害自由。<sup>[22]</sup>

## 二、民主失败：民主是否可能，是否可欲？

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规模存在的、有价值的民主主要存在于古代希腊。然而，希腊民主在时间上短暂得可怜，只有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在希腊的某些地方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民主。古代罗马与漫长的中世纪根本无民主可言。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民主，而且，民主化的三次浪潮又常常为“回潮”所打断。有典型民主存在的时间大致如下：



在对民主发展感到鼓舞与欣慰的同时，达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明确指出：

不论是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实践，纵观整个有记载的历史，等级制一直处于支配性地位，而民主常常是例外的情况。即使是在 20 世纪后期，“人民的统治”这种合法性也不过口惠而实不至而已，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少数人民是在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的统治之下的。<sup>[24]</sup>

事实上，民主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失败的。对民主进程的这种审视使西方人相信，“民主遭遇失败是非常普遍的事情”。<sup>[25]</sup> 民主思想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承认，“再也没有比罗列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民主方法的失败事例的清单更容易的事了”。<sup>[26]</sup> 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更是罗列了民主政治的四大罪状：“腐败、无法律、软弱和不民主。”<sup>[27]</sup> 人们看到，在价值愈来愈多元化的当代西方世界，民主可能会威胁其他价值，甚至成为不宽容的根源和工具。<sup>[28]</sup> 相比来看，中文学术界可能对“民主失败”表示惊讶，而且亦很少对民主失败作理论上的审视。<sup>[29]</sup>

尽管我们不能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找到关于“民主失败”的明确表述，但是，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对民主政体的不满。西方政治发展的历程不但划清了一条民主政体不断进化并愈来愈成为“世界政体”的线索，还隐含着另一条常常被人们忽略却又极为重要的线索：民主失败。

从这个角度看，达尔的用心良苦不但表现在他对民主的鼓与呼上，而

且还表现在他对民主失败的分析与批判上。事实可能正如达尔明确指出的那样，民主的批评者往往会注意那些民主的倡导者倾向于忽视或是掩盖了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民主的批评者为民主作出的理论贡献可能并不亚于民主的倡导者。

在西方，对民主的批判与民主一样源远流长。苏格拉底这位希腊人为民主的希腊开创了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色诺芬再到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民主的传统。古罗马人宁愿相信混合政体，更多地依赖法治；在中世纪，上帝的声音淹没了民主的要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没有忘记抨击民主。中世纪的思想巨人托马斯·阿奎那曾这样指称民主，“当邪恶统治是由多数人实行时，那就叫做民主”。<sup>[30]</sup> 其对民主的态度可见一斑。

当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合法性岌岌可危时，人们再一次将理性的目光投向了民主，“民主”被绣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上。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对民主的普遍反动：美国革命很快从《独立宣言》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以所谓“民主”的方式给民主带上了枷锁；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甚至被视为“欧洲的耻辱”，成为欧洲现代政治文明成长过程中一块刺目的伤疤……“法治优位”的美国革命成了一场“反民主”的革命；而“民主优位”的法国革命却在革命失败后为批判民主提供了素材。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全面地走向保守：在英美两国，作为民主核心原则的多数原则一直作为“一种政治的和哲学的担心”而存在<sup>[31]</sup>；在欧洲大陆，民主亦遭到冷遇，保守主义大行其道。

回顾西方民主由远及近、由弱而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伴随这一过程的并不是对民主政体迷信式的崇拜；恰恰相反，人们越是了解民主，民主头上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就越显暗淡。在当代西方，以数学推理和经济分析的手段来透视民主的种种弊端似乎成了理论界的拿手好戏。人们看到，不仅那种负载了过多价值的古代民主理论存在着种种弊端，而且，表现为一种程序的现代民主亦漏洞百出。在现代科学高倍的“显微镜”下，人们以精确的数理分析验证民主，几乎一致地发现，民主不止是不完美的，甚至是病态的。